

晚明蘇州服俗變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鄭揚馨

明代是中國傳統社會發生顯著變革的時期，中期(1506-1520)以後，新興經濟因素的產生，社會生活、思想觀念的變異，顯示正德前後迥然不同的文化風貌；由明初的保守、沈悶，逐漸趨向革新活躍。這種社會風尚變遷始於以蘇州府、松江府為中心的江南地區。這樣的變遷與此區域蓬勃的工商業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商品經濟的繁榮與新興市鎮的萌生、城市的迅速擴大，又進一步推動工商業更趨活絡。此一情況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連帶影響人們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心理意識的變化，新社會風尚於焉產生。

江南地區可說是明代中後期社會風尚最早發生變化的代表地區，是新興城市生活形態向外傳播的主要源頭與中心。就其變遷方向及內容而言，服飾風尚的轉換是最為顯著而普及的現象。城中市民競相追求華美新異的服裝式樣，出現去樸從豔、違禮逾制情形，奢侈之風瀰漫。這又從另一側面透露出此一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蘇州向以絲織及棉織業興盛，並商業貿易高度發展而聞名。此一背景與其服飾風尚變

遷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的關係。以下將透過對蘇州地區服飾風尚的更移情況與其經濟發展間相關程度之探討，來考察這一互相影響過程的可能面貌。

關鍵詞：晚明 蘇州 經濟發展 服飾風尚 絲棉織業

1、前言

明代是中國傳統社會發生顯著轉變的時期，此一轉變的普遍化表現在正德、嘉靖之後，由南到北、由中心城市到周圍城鎮、農村均顯示出社會風尚變化的擴散軌跡。從明初到中後期的過渡階段當中，展現的人口持續增長、經濟貨幣化和多樣化(如農村商業化、定期集市和小鎮激增、作物專門化、手工業之發展，及國內地區性貿易市場之形成)、社會流動的增長、租佃制與經濟競爭的展開，與政治秩序的集權化與系統化等，種種因素的互相關連所產生的影響，使晚明顯示出它與前一時代本質上的不同¹。這一社會極大變動的最顯著特徵即「波頹風靡」²世風的產生與傳播。此種轉變過程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城市中表現尤為明顯。而江南地區是社會風尚轉變過程中最早區域，蘇州更是民風散播的關鍵中心。在成化、弘治年間，即15世紀50、60年代已初顯變化，並反映在市民日常生活如食、衣、住、行、休閒娛樂等各方面。一般而言，一代生活的形成乃至變異，必然意味社會關係及相關社會秩序的變化；而生活變化之產生亦與經濟、社會、思想、心態諸多層面有密切關連。

1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1。

2 陳寶良，《悄悄散去的幕紗：明代文化歷程新說》(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4。

就明代江南地區社會變革與經濟發展狀況而言，學界的相關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成果十分豐碩；尤以對此區域手工業、商業及商品化農業等經濟生活面向之研究為多。如傅衣凌、李伯重、韓大成³等學者對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與市場流通狀況、市場運作、交換機制之進行，及手工業生產的興起、城市化問題等面向之研究有十分特出之貢獻。其中，中國大陸自上世紀 50 年代以來，學界對江南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興起，相關研究著作勾畫出了明清江南工商業發展的大致輪廓，也為研究明清江南經濟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對進一步瞭解包括蘇州在內的江南工商業發展情形，有相當助益⁴。此外，不少學者們也對江南紡織業部門在明清及其前後的發展情況作了專門研究。其中，徐新吾、范金民在明清江南絲織業研究方面貢獻尤大⁵。

以蘇州為特定範圍之經濟發展研究則有范金民、王家範、劉石吉、趙岡等對蘇州城市經濟活動之結構、功能與發展特色之探討。其中范金民對江南及蘇州地區商業及絲棉織手工業發展，包括商品生產、交換之市場網絡涵蓋範圍及商品流通機制之運作、不同層級市場的聯繫情形、商品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影響作了深入細密的分析⁶。

3 參閱傅衣凌，《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李伯重，《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臺北：聯經，2002）；韓大成，《明代社會經濟初探》（北京：人民，1986）。

4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頁33-35。有關明清江南地區資本主義萌芽之研究可參閱許滌心、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臺北縣：谷風，1987）。

5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頁35-36。有關江南地區紡織手工業發展可參閱范金民、金文，《江南絲綢史研究》（北京：新華書店，1993）；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1991），頁24-38。

6 參閱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至於有關社會風尚變遷課題的研究，以牛建強的《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以大量材料為基礎，抓住反映社會本質變化之現象，嘗試擬構出一種以符合社會自身發展內容來測定變遷方向的理論體系，以考察這種社會風尚變化的總體情況、各種變化現象間的內在聯繫，彌補由純粹經濟活動探討社會發展動因的解釋途徑之不足⁷。陳寶良提出了對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的前提與背景環境之分析探討，將觸角由專門關注經濟因素對風尚變遷的影響，擴大到社會、政治背景所提供的有利條件，也對社會生活各方面變化的內涵、現象及特徵皆有詳盡清楚的闡釋⁸。至於對蘇州民風嬗變課題的探討，則有王衛平的相關論文及專書，闡述此區域風尚變遷內容、面向及其影響與意義⁹。林麗月、吳美琪等聚焦於服飾風尚變遷所反映文化意涵的相關研究¹⁰。

大致說來，這些研究皆以大量史料為基礎，勾勒出明代中後期社會風尚轉變的具體內涵，及其與社會思想及觀念變化的關係，並評價此現象在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意義。綜論之，這些研究大致指出十六世

1998)。

- 7 參閱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 8 參閱陳寶良，《悄悄散去的幕紗：明代文化歷程新說》，頁111-124；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頁1-43、190-252。
- 9 參閱王衛平，《蘇州史紀》(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陳寶良，〈明清時期太湖地區的奢侈風氣及其評價〉，《學術月刊》，2(上海，1994)，頁56-61。
- 10 參見林麗月，〈明代中後期的服飾文化及其消費心態〉，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頁467-508。另有關國內外學界對晚明社會文化變遷研究成果可參考林麗月，〈世變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明史研究通訊》，4(臺北，2001.12)，頁9-20；吳美琪，〈流行與世變：明代江南士人的服飾風尚及其社會心態〉(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101-127、145-176。

紀以後，明代社會風尚變遷最主要的動力來自於商品及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不僅滿足了城市居民基本生活需求所應具備的消費能力，也使官僚、士紳、商人階層更有餘力追求高層次而多元化的消費途徑。追逐時尚之潮流於焉形成，並普遍瀰漫於繁華城市中。服飾風尚的更移所造成的影響，不僅及於上層社會的官僚、士大夫或富有貲財的商人，甚至一般庶民都加入競相追求服裝時尚的氛圍中。

本文主要目的即欲將蘇州服飾風尚與當地社會經濟變遷加以聯繫，透過綜合學界相關研究成果，考察此一風尚轉化表現在具體穿著方式、消費行為、價值心態、消費觀念上的變革現象，並分析其所呈現出的特色與蘇州經濟發展狀況的關係。

2、服飾風尚變遷與社會價值觀的互動

明初政府制訂了一連串與日常生活相關的禮制，嚴明上下尊卑及貴賤等不同地位等級之人的區隔與相應位置，規定社會各階層的待遇與生活方式。服飾自然也是整套規範之內的重要部分，於是朱元璋下詔頒佈了一套服裝等級制度，同時也藉此恢復漢族原有服式，以別華夷，因而規定恢復唐代衣冠制度。各種冠服細節之釐定，前後歷時約三十年。明太祖親自參與，上自皇帝后妃的禮服與常服，文武百官的朝服、祭服、公服、常服，下至庶人、僧道、農夫、商賈、樂妓的服飾，從式樣、質料、尺寸、顏色，以至衣長袖長，鉅細靡遺¹¹。每制訂一種服式，太祖必命禮官與儒臣稽考

11 洪武三年，規定「庶人初戴四帶巾，改四方平定巾」，雜色盤領衣，不許用黃。又命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繡、錦繡、紵絲、綾羅、止許紬、絹、素紗，其靴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首飾、釵、鐲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洪武六年，規定庶民巾還不得用金玉、瑪瑙、琥珀、帽不得用頂，帽珠止許用水晶、香木。明·申時行纂，《大明會典》（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據萬曆刊本影

古制上聞，然後由太祖親裁。其後又陸續下詔規定儒士、生員及商人應遵守的服制。這些規定凸顯了官民之分、良賤之別。在服飾等級制度的維護上，明初即訂有嚴懲冠服違制者的刑律。其施予對象包含二層次，即「違式」及「違禁」。前者包括庶民僭品官、低品官僭高品官；後者則指官民僭用皇帝御用之物¹²。

大體說來，此種對不同等級身分之人相應服式嚴格限制的內含意義，是為維繫貴賤尊卑之分，也反映了政府對士人服飾的重視，及對商人外觀的規範限制，以凸顯其特殊性，貶抑其社會地位，恢復「敦樸之風」，戒奢侈，求儉素，以合於傳統儒家倫理與禮教精神。其目的皆為規範人們符合自身身分地位應有的行為，以維持國家權威、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就實際施行狀況而言，明初因禮法嚴整，對違禮僭分者多嚴懲不貸，加以改朝易代之際，遭受戰亂破壞，社會經濟仍待恢復，士庶限於財力，使服飾等級制度尚能維持¹³。

然自明中期以後，江南地區首開風氣，服飾風尚迅速掀起巨大變化，新的趨勢產生。此一變遷自有其社會基礎。由於明初以來自然經濟的恢復、手工業的進步與商品經濟愈益興盛、城市更趨繁榮，致使人們物質生活獲得改善，累積了更高消費能力，並為服飾實用化、美學化提供物質基礎。此外，朝廷自永樂以後對服制的控制稍寬、苛政緩解。孝宗以後諸帝較疏於朝政，王綱日趨解紐，更導致禮教規範的鬆綁，促使服飾上衝破傳統等級制度。同樣重要的是明代紡織技術的進步與改良，染色技術的提

印)，卷61，〈冠服二〉，頁35-37。

12 參林麗月，〈明代中後期的服飾文化及其消費心態〉，《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文集歷史組—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頁473。

13 有關明初服飾等級制度內容，另可參閱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頁190-196；毛佩琦主編，《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頁320-323；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臺北：南天，1998），頁271-272。

升，海內外貿易的開拓及由此帶來的海外原料的輸入，亦促成服飾的多樣化。在此一經濟發展與社會風尚變遷背景下，民俗生活方式、社會集體心態及思想意識或價值觀念也發生轉化。以蘇州服飾風尚中外顯變化現象來觀察，可從中發現新興社會心態、社會價值及消費觀念因子的產生，及其在推動社會各階層成員外部行為轉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最能表現變化前後差異的消費心態，及相應消費行為的特徵應為僭禮逾制、競相奢侈及追逐時尚風氣的形成。

(1) 僭禮競奢

就明清時代中國第一大工商業都市蘇州來說，由於其得天獨厚的社會經濟條件，為服飾風尚變遷最早發生的地區之一，服裝式樣最為新潮，成為時尚散播源頭。在侈靡追求上，蘇俗具有領導性地位，號稱：「奢靡為天下最」¹⁴，成為四方效尤之地。如《松窗夢語》有云：「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¹⁵。《四友齋叢說》作者何良俊也說道：「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於蘇州，波及松江……諺曰：『……八清誑，綿綢直裰蓋在腳面上』」¹⁶。奢侈之風自成化時已初見端倪，開始有了「綺靡之服」、「金珠之飾」，而這時服飾變化主要表現在衣料上。成化年間，蘇州府吳江縣在服著上，「庶民之家僭用命婦服飾，加以鈿花、銀帶，恬不知愧」¹⁷。弘

14 清·龔煒，錢炳寰(點校)，《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5，〈吳俗奢靡日甚〉，頁113。

15 明·張瀚，盛冬鈴(點校)，《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百工紀〉，頁79。

16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收入《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據明萬曆七年張仲頤刻本影印)，卷35，頁1155。

17 明·莫旦，《(弘治)吳江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據明弘治元年刊本影印)，卷6，〈風俗〉，頁236。

治年間蘇州城的情況是「其俗多奢少儉」，「精飲饌，鮮衣服，麗棟宇」¹⁸。穿著方式的極大變化可由龔煒《巢林筆談》論及吳地風俗侈靡的見聞中窺見一斑：「余少時見土人僅僅穿裘，今則里巷婦孺皆裘矣；大紅線頂十得一二，今則八九矣，家無擔石之儲，恥穿布素矣；團龍立龍之飾，泥金剪金之衣，編戶僭之矣」¹⁹。然而自嘉靖以降，奢僭倍之，全國各地「無貴賤悉然」。服飾變化除衣料外，更多表現於式樣，人們根據自身愛好決定享有之服飾²⁰。蘇州婦女是十分明顯之例證。她們所穿的裙裾，起初是裙拖六幅，後又流行細褶，改為八幅，又攢幅為五彩，為四方崇尚仿效的對象²¹。

此種變遷表現了僭禮逾制的現象，打破了明初以來朝廷規定的服飾定制，沖撞了貴賤尊卑之別的传统秩序與社會價值。衣服質料由布素而追求錦繡、綾羅顏色由黯淡樸素趨於鮮豔華麗，式樣由劃一單調而追求奇異翻新，所謂：「衣則忽長忽短，袖則忽大忽小，冠則或低或昂，履則忽銳忽廣。造作者以新式誘人，遊蕩者以巧治成習」²²，甚至到了男女混雜的地步。以服飾為突破口，對傳統價值造成極大挑戰。

這種奢僭之風的瀰漫，源於官僚仕紳、富商大賈等社會上層人士或富有財力者互相攀比、競爭所起的推波助瀾功效所致。所謂「豪門貴室，導奢導淫」，道出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甚至鄉村地區亦受感染。嘉靖年

18 明·林世遠、王鑿纂修，《(正德)姑蘇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26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正德刻嘉靖續修本影印)，卷13，〈風俗〉，頁227。

19 龔煒，《巢林筆談》，卷5，〈吳俗奢靡日甚〉，頁113。

20 參見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南開學報》，4(天津，1994)，頁54。

21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頁204-205。

22 清·袁棟，《書隱叢說》，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1137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據清乾隆刻本影印)，卷9，頁531。

間，蘇州有一人名吾謹，因「天性機穎」，便「負奇傲世，謂天下才無如己者」。同鄉人方豪也自負才名，喜好奢侈，花千兩銀子置買衣服。吾謹聞訊後，便從富家借貲，也置千金之衣²³。這一事例反映了好尚虛榮風氣的普遍性，即人們不論貧富，每逢佳節，必競購什物；家中經濟拮据，卻恥於穿著布素；甚至有貧者與富人競鬥奢華，至倒囊不計；有人用一年生活費用，置一裳而無餘。許多人並不具有講求奢侈揮霍之基礎和實力，卻由於社會心理影響、制約而志於追求超越自身經濟能力所能負荷的消費目標，而形成一種新的社為行為模式與文化氛圍²⁴。

(2) 追逐時尚

商業化後果導致服飾風尚發生變化，等級制度崩解，僭禮逾制情況出現時，追求服飾華美新異的行為也相應產生，匯聚成追求時尚的風氣，流行色與流行面料相繼問世，時裝亦上市。這樣的時尚舞台是展示、誇耀社會地位、物質財富的最佳場所。透過追逐「時樣」，不論貧富貴賤或性別，各種各樣不同社會階層之成員競相尋求自我認同與價值提升的途徑。若不斷前進的爭逐奢華之風磨滅了貧富、城鄉、士紳和平民之間，以及菁英和大眾之間的界線，使社會地位不再能透過服飾表現出來時，時尚的新標準將為掌握其控制權和詮釋權的社會上層人士重新界定。於是，富豪不斷以翻新服飾質料與色彩，儼然成為流行時尚領導者後，晚明若干文士轉而以「品味」為區分身分地位方式。蘇州因其豐富的經濟與文化資

23 明·屠隆，《由拳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據明萬曆間刊本影印)，卷19，〈吾謹〉，頁1027-1404。

24 參閱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頁83；吳琦，〈晚明至清的社會風尚與民俗心理機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6(武昌，1990)，頁78。

產，成爲凝聚品味最適合處所之一，以致服飾風尚由「去樸從豔」，轉向「雅素相高」，「蘇樣」成爲明末時尚的新主流²⁵。

「蘇樣」服飾蔚爲時尚，約始自萬曆後期，源於時人對蘇州文人文化的崇拜。但最初重意象而不重實物的模仿，故又稱「蘇意」。整體而言，蘇樣是以雅士的穿著爲主體，在配飾上強調蘇州精巧手藝與上等而素雅的織品，而以精緻質料和紋樣裁製的道袍爲其基本款式。此種服飾的傳播，造成前此崇尚炫麗的風氣在明末逐漸消退，而由雅素相高的審美觀取代。如吳縣在崇禎年間「冠服樸雅，帶時制之冠，雖樵耕不去首。東洞庭女裝，大略效南部」²⁶。但雅素風格的蘇樣，實爲文人雅士展現品味的理念，與商販交易及市場流通的實際操作面的混合體。而四方的模仿更是蘇樣風尚形成的要素，充分反映晚明文人雅士經濟豐厚、不事生產的優越社會地位。由其他地區對「蘇樣」的模仿行爲中，可窺見追逐流行時「變異」與「趨同」不斷交替的過程。趨同者不斷透過追趕蘇樣，以達品味與身分地位的提升，而後者又透過不斷翻新花樣來操控時尚的新意涵。在晚明的品味競賽中，蘇州文人顯然壟斷對雅俗之分的定義，成爲引領時尚的中心，也使時尚流行方向由競奢、求新至美學品味與文化符碼轉移的新指標，更能反映晚明物質文化與消費意識發展的新風貌²⁷。

25 林麗月，〈明代中後期的服飾文化及其消費心態〉，《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頁493-494；Timothy Brook(卜正民)著，方駿、王秀麗、羅天佑譯，《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2004)，頁298-302；吳美琪，〈流行與世變：明代江南士人的服飾風尚及其社會心態〉，頁83-100。

26 明·牛若麟纂輯，《(崇禎)吳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10，〈風俗〉，頁894。

27 林麗月，〈明代中後期的服飾文化及其消費心態〉，《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頁495-496、502；吳美琪，〈流行與世變：明代江南士人的服飾風尚及其社會心態〉，頁101-127、145-166。

3、服俗更移的經濟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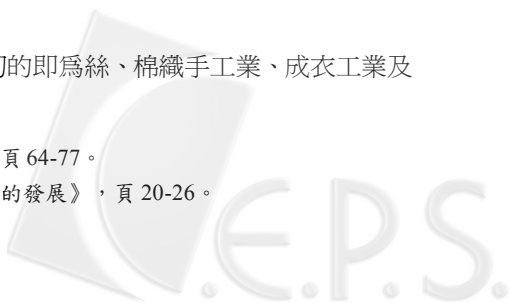
蘇州成爲服飾風尚變遷方向的源頭及中心，其經濟發展狀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隨江南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蘇州經濟地位日益提升，發展成爲顯著的區域中心城市。以其經濟結構而言，自唐至宋，蘇州農業、手工業及商業持續穩定前進，爲明代以後成爲全國最大工商業城市奠定雄厚基礎。水利的興修、圩田的增加，及深挖土地潛力，注重精耕細作，使蘇州農業生產有明顯進展。太湖地區成爲宋代全國著名糧倉。至南宋時，「蘇湖熟，天下足」和「蘇常熟，天下足」之諺不脛而走。糧食產量增長，促進手工業發展。宋代的蘇州已是絲織品生產最爲發達地區之一，不僅數量超過前代，質量也大爲提高²⁸。

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促成商業的興盛。商品經濟的逐步成長加強了城鄉經濟的聯繫，蘇州府城周圍市鎮逐漸興起。此一過程來自於重賦壓力及自然地利條件及利潤的誘因，使蘇州郊區鄉鎮紛紛發展農副業。而城市商品經濟的深入這些地區，導致面向市場生產的商品農業、家庭手工業獨立專門經營的情況逐漸產生²⁹。分工與專業化的加速擴散推進，促使蘇州沿太湖流域專業市鎮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此一過程在明中葉後愈加顯著。此種分工與專業化現象又繼續向廣大農村地區深入，而農村經濟的進步與商品生產的興旺，通過廣大農村和專業市鎮、集市貿易的聯結，又刺激城市經濟更趨繁榮。社會流動的頻繁、工商業的進步與發達，塑造了明清時期生氣蓬勃的蘇州城市風貌，凸顯其在明清時期在全國經濟生活中的特出地位。

至於與蘇州服飾生產關係最爲密切的即爲絲、棉織手工業、成衣工業及

28 參閱王衛平，《蘇州史記》，頁64-77。

29 參閱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頁20-26。



商業貿易的繁盛。綜括而言，城內商業主要集中於西半部，絲綢和棉布貿易極盛；城東則為絲織手工業集中地。在明末清初，其城市產業特色即以紡織商品之生產與交換為主體。以下將分別介紹為服飾風尚形成與傳播提供憑藉機制的絲、棉織手工業，及成衣業發展狀況。

(1) 絲織業

蘇州「以杼軸冠天下」³⁰，人們稱之為「家杼軸而戶纂組」³¹，其生產方式包括官營及民營二類。前者是由政府所設蘇州織染局經營，生產性質最初是為承擔歲造緞匹(用於賞賜)的織造，永樂以後開始織造上用袍緞(供應皇室)，上用和歲造同時生產。後隨加派激增，上用緞匹在局內生產，而歲造緞匹改由民間在局外領織。此後雖因皇室靡費生活需要而加派緞匹，反而影響歲造，甚至導致民間機戶負擔加重，上演官民衝突。這也說明了為數浩繁的絲織品加派的事實，是建立在與官民營絲織業發展興盛的基礎上。因此，它一方面反映了明廷對此地區無限制的搜刮，同時亦反映明中期後，全國官民營絲織業之發展皆以江南地區獨占鰲頭。但明末由於加派的增重，官府為籌措錢糧而窮極蒐羅之作法，使機戶遭無端掠奪，從而影響其生產的維持和發展，導致明末蘇州官營絲織業的衰落³²。

至於蘇州在明代民營絲織業的發展，自嘉靖後漸趨繁榮。蘇州民間絲織業在城市中多為個體機戶的小商品生產，在農村仍以家庭副業生產為主。

30 明·申時行，《賜閑堂集》，卷12，〈贈長洲考績馳封序〉。轉引自《中國經濟通史》(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發行，新華經銷，1998)，頁261。

31 明·顧秉謙等修，《神宗實錄》，收於《明實錄》第96-12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紅格鈔本所缺則據別本補)，卷361，頁5a，萬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32 參閱范金民，《江南絲綢史研究》，頁114-137。

據嘉靖《吳邑志》記載：「產兼二邑[吳縣、長洲]，而東城[指長洲縣之蘇城部分]爲甚，比屋皆工織作」³³；鄰近蘇州的崑山人顧炎武則稱萬曆末年「城中機戶數千人」³⁴，說明從事絲織業人數之眾，顯示此一產業在蘇州城的重要地位。此外由於蠶桑與絲綢生產的分工與專業化趨向，蘇州沿太湖地區亦出現一些專門從事絲織手工業的專業市鎮，如盛澤、震澤、黃溪鎮等。這些鄉鎮絲織業自明後期開始獲得顯著發展。其中蘇州府吳江縣的地方文獻記載：

綾紬之業，宋元以前，惟郡人為之，至明熙宣間邑民始漸事機絲，猶往往雇人織挽。成、弘以後，土人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於是盛澤、黃溪四五十里間，居民乃競逐綾綢之利。有力者雇人織挽，貧者皆自織，而令其童稚挽花……而絲之豐歉，綾綢價之低昂，即小民有歲無歲之分也。³⁵

反映了盛澤等專業市鎮居民高度依靠絲織業維生的景況。

在蘇州絲綢生產市場導向性質增強的過程中，呈現的最明顯特徵即分工與專業化的加強，及雇傭勞動制度的出現。就前者而言，一方面是植桑養蠶至紡織加工的商品農業與手工業的分離；而另一方面，生絲生產內部種桑與養蠶、繅絲及綢緞生產內部各工序也逐漸脫離。明代蠶桑業最盛地區主要集中於杭嘉湖平原與蘇州沿太湖地帶。其中湖州府最爲發達，有「湖絲遍天下」的說法。其所產生絲爲蘇州城及盛澤鎮機戶紡製「蘇經」或「吳綾」原料的重要來源。至於絲織品生產內部分工方面，其主要環節是紡

33 明·蘇祐、楊循吉，《(嘉靖)吳邑志》(台南：莊嚴文化，1995，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卷14，〈物貨〉，頁376。

34 清·顧炎武，《亭林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上海涵芬樓景印康熙刊本)，〈中憲大夫山西按察使寇公墓志銘〉，頁9。

35 清·陳荀鑣等修、倪師孟等纂，《(乾隆)吳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清乾隆十二年石印重印本)，卷38，頁1119。

經、絡緯、練槌染色、牽經、接頭(結線)和絲織。明代後期蘇州民間絲織業大作坊或手工工場中，織與挽絲等工序之間可能已有較明確之分工，但就一般情況而言，除染色外，其他工序之分離尚未十分明朗，但已呈現出生產方式進步³⁶。

此外，明後期開始，民間絲織生產方式出現某些新變化，較大規模的手工業作坊生產模式出現。有一部分累積較多財富的個別生產者，轉變為手工作坊主或工場主。如蘇州富民潘璧成，其家「起機房織手，至名守謙者，始大富至百萬」³⁷；常熟人蔣以化寫道：「我吳市民，罔籍田業，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趁織為活。每晨起，小戶百數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呼織，日取分金為饗飧計。大戶一日之機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兩者相資為生久矣」³⁸。此外，應天巡撫曹時聘萬曆年間曾目睹「染坊罷而織工散者數千人，機戶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³⁹。說出「以機杼致富者」雇聘具自由身分之「良民」，以市場為導向從事生產的情形，反映了「機戶(大戶)出資，機工(小戶)出力，相依為命」⁴⁰的雇傭勞動關係景象。

36 參閱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頁49-50；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頁59-60。

37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據清道光七年姚氏扶荔山房刻本)，卷28，〈守土吏狎妓〉，頁713。

38 明·蔣以化，《西台漫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子部·雜家類》第66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萬曆二十一年自刻本影印)，卷4，頁277。

39 《明神宗實錄》，卷361，頁5b，萬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40 《明神宗實錄》，卷361，頁5a，萬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2) 棉織業

明代蘇州府城本身並非棉布生產中心，而是棉布加工與銷售中心。此時期棉布生產最盛的地區主要因自然環境限制—水道淤淺或田土高仰而不斷改稻為棉，以致棉織業發達。其中最著名產區為松江地區。而蘇州地區各縣也都產棉，並以嘉定、常熟二縣為盛⁴¹。嘉靖、萬曆年間，嘉定「邑之民業，首籍棉布，紡織之勤，比戶相屬，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際養生送死之費，胥從此出」⁴²。可見嘉定棉織業從業人數之眾，賴此為生程度之高。而常熟所產棉布「工有精粗」，工細者出售，甚至「工粗而染惡者亦售」⁴³。歸有光在談到昆山縣時，也說：「土人專事紡機」⁴⁴。這些皆反映出蘇州地區棉織專業市鎮在全國棉布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

一如絲織業，棉織品生產亦呈現分工與專業化特色。其主要生產環節是軋花、紡紗(包括彈棉、搓條、紡紗、成絨)、織布(包括漿紗、千經、穿綜、穿筘、搖殺、織布)、染色、踹壓等。其中染色、踹壓主要集中於城市，其他則分佈於鄉村。而棉織業中最重要分工與專業化是紡與織二大工序的分離。但從事棉紡織品生產的廣大小農家庭中，由於在這二大工序中，勞動力分配運用及收益高低呈現差異與不均衡，而逐漸需傾向單一專門生產工序的分工發展趨勢。至於染、踹工序方面，明代後期蘇州染色業已發展起來，從事染色

41 林世遠、王鑿纂修，《(正德)姑蘇志》，卷14，〈土產〉，頁244「木棉布，諸縣皆有之，而嘉定、常熟為盛」。

42 明·韓浚等修，《(萬曆)嘉定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據明萬曆三十三年刊本影印)，卷6，〈田賦·物產〉，頁476。

43 明·馮汝弼、鄧鞞纂修，《(嘉靖)常熟縣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27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嘉靖刻本影印)，卷4，〈食貨志〉，頁1053。

44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康熙本)，卷8，〈論三區賦役水利書〉，頁109。

的工匠有數千之多。大體來說，不論城鄉，除染色加工業外，其餘皆屬個體性質、分散生產的家庭手工業⁴⁵。然而在蘇州地區，其從業人數之眾反映棉織品在江南地區，甚至全國經濟社會生活中需求程度增高，凸顯出其重要性。

(3) 成衣業

隨手工業部門中社會分工的擴大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衣服巾帽鞋襪的製作也開始向專業化與商業化前進。明代江南的服裝生產已成爲一個相當重要的獨立生產部門，因立基於絲棉織業發達的基礎上，明清江南成衣業亦逐漸興盛。萬曆時，謝肇淛指出：傳統輿論認爲天下「九福」中，燕趙有「衣裳」之說有誤，實際情況是「衣裳福則燕趙遠遜吳越」⁴⁶。張瀚更明確指出：「自金陵而下，空故吳之墟，東引松常，中爲姑蘇，其民利魚稻之饒，極人工之巧，服飾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至於奢侈者，爭趨效之」⁴⁷。可見明代以後蘇州製服業之水準應處於全國前列地位。

4、服飾變遷與商品經濟結構的關係

明代蘇州服飾風尚的形成，變異以致帶動天下追求時尚衣著的現象，爲其高度發展的城市物質經濟生活的表徵。後者爲前者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與背景。前述蘇州地區絲棉織業及成衣生產狀況的興盛與進步，帶動質與

45 參閱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年)》，頁61。

46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入《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據明萬曆四十四年如書軒刊刻本)，卷4，〈地部二〉，頁1556。

47 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記〉，頁83。

量的增長，而商業高度發展更是服飾風尚散播不可或缺的基礎。

宋元時期，蘇州郡城在農業發達及手工業經濟逐步穩定發展的基礎上，已成為一個商業性城市。但工商業發展突破以往，成為江南區域中心，甚至全國中心市場，須待明中葉以後。因自明初以來，蘇州必須承受沈重的賦稅負擔，以達到政府在經濟上壓制蘇州而提升南京地位的目的。但由於大運河幹道流經蘇州，到15世紀中葉，完全恢復了它在王朝建立初期被削弱了的經濟實力。此後蘇州與江南區域內及全國其他區域間經濟聯繫日益加強，代表了江南地區經濟水平和市場特色，且具有更廣泛的跨區域功能，反映了全國性某種或若干商品流通規模和水平，與海外市場亦有聯繫，因而成為全國中心市場。蘇州貨物進出口暢達，盛產絲綢、布匹、書籍、各種日用品和工藝品，輸向全國乃至海外，又從全國各地輸入各種工業原料、居民糧食和工業用糧，擔負轉輸全國各地商品之職能，也供應海外市場的需求。全國各地商人，尤其擁有雄厚資產，在經濟活動中執牛耳的著名大商幫在此長期經營，展開激烈競爭，在促進蘇州的國內外貿易發展上，發揮極為關鍵的影響力。

明代蘇州工商業的蓬勃發展表現在城市的繁華上。其西半城商業區市場廣大，市集貿易、鋪戶貿易興旺，且量大而品多的長途轉運貿易極為發達。明後期，閶門北碼頭抵胥門五六里間，居民櫛比，牙儉叢集⁴⁸。許多當時人的詩文記載中生動地反映了這一景況。明代中期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稱的唐寅曾寫過一首《閶門即事》詩，描繪閶門一帶工商業盛況：「世間樂土

48 《(嘉靖)吳邑志》記載：「此河(運河)自閶門北馬頭抵胥門館驛，長五六里，東西兩案，居民櫛比，而西岸尤盛」，卷12，〈城外河渠〉，頁360；明·牛若麟纂輯，《(崇禎)吳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10，〈風俗〉，頁892。「城中與長洲東西分治，西較東為喧鬧，居民大半工技。金閶一帶，比戶貿易，負郭則牙儉輳集」，顯示明代蘇州城西部是人口密集和商業繁盛之區。

是吳中，中有閶門更勝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⁴⁹。十分適切呈現了城西閶門一帶樓閣林立，店肆充斥，鉅額商貿通宵達旦進行的熱鬧喧騰景象，是人們所嚮往的人間天堂，其繁華程度是任何高明的畫師也難以描繪的。自南濠至楓橋將近十里，人煙湊集，商賈雜沓，「凡上江、江北所到菽麥棉花大貿易咸聚焉」⁵⁰。人稱「凡四方難得之貨，靡所不有……天下財貨莫勝於蘇州」⁵¹。直到明末，城中的且城市，為「兩京各省商賈所集之處」。上塘、南濠「為市尤繁盛」，當地人稱閶門「錯繡連雲，肩摩轂擊，楓江之舳艫銜尾，南濠之貨物如山」⁵²。以上描述反映出經濟功能的日益提升，提供了城市居民能追求奢侈豪華、舒適愜意生活的物質基礎。

明代蘇州城市經濟繁盛程度及其中心市場的地位，連同為工商城市的杭州也難望其項背。她以整個太湖流域為縱深的市場腹地，將整個江南地區，特別是蘇松嘉湖等府的各專業市場以至基層初級市場結為一體，在江南市場群中起著中心樞紐作用，並以東南地區最重要區域市場的地位，躋身全國中心市場行列⁵³。商品經濟的繁榮、商業貿易網絡、市場流通體系的愈趨完善，為大量而質優的絲棉織品在區域內部、區域間及全國範圍內的交換流通建立通暢管道，為服裝時尚發展提供了適當舞台。以下將進一步分析服飾風尚與絲棉織品質與量的提昇及絲棉織品貿易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以考察多樣化而質佳的衣料大量來源及廣大市場的需求和供應如何更直接、更明顯促進蘇州服飾風尚的變化。

49 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頁48；王衛平，《蘇州史記》，頁118。

50 蘇祐、楊循吉，《(嘉靖)吳邑志》，卷12，〈城外河渠〉，頁360。

51 清·湯斌修、孫珮纂，《(康熙)吳縣志》，卷26，〈兵房〉轉引自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頁114。

52 牛若麟纂輯，《(崇禎)吳縣志》，〈王心一序〉，頁17-18。

53 參閱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頁143-147。

明代蘇州絲織生產工藝的進步使產品種類多達數十種，色彩至明末已達120餘種。且因其織造染色技術水平之高超，能生產高級綢緞即「熟貨」。其產品主要包括緞、錦、紗、羅、綢、絹、縐、綾等。其中錦有海馬、雲鶴、寶相花、方勝等。「五色炫耀，工巧殊過，尤勝於古」。紵絲有素有花，紋有金縷彩妝，其制不一，皆極精巧。羅有花羅、素羅、方羅、河西羅；紗有銀條、夾織、金縷、彩妝、縐紗。其他如綾、絹、綢也名色繁多⁵⁴。就商品量而言，明後期，蘇、杭一代民間機戶的織機約為官織局的三倍，粗略估計絲織品的上市量，每年可達30萬匹左右，價值約在30萬兩左右⁵⁵。

至於棉布品質方面，諸如三梭布、斜紋布和剪毛毯，都反映了精湛紡織技術。但此三者均產量少、價昂，只作為統治階層之高級消費品，非一般大眾能負擔與享用。一般平民主要服用青藍大布。然而，此種棉織布料的生產發達、織造染色技術的提升促使品質逐漸進步。《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中記載蘇州所產棉布有刮白布、腰機布、官機布、紫花布、縑絲布、飛花布、棋花布、斜紋布、藥斑布之類⁵⁶，都是質地精緻的名品⁵⁷。

當絲棉織品數量與品質大為增進時，在商品經濟發達，國內外貿易興盛的環境下，開拓了廣大市場，促使絲綢及棉布商品流通情況愈趨繁盛。在棉布貿易方面，其市場的形成與發展和國內區域間棉織業發展的不

54 織造技術由「生貨」生產向「熟貨」生產的轉變，促進染色技術的進步與絲綢色彩的多樣化。明代前中期絲織品染色布多採用未經練白的生絲，故無法染出鮮豔的淺色，且最深只能染成緇皂色（即生貨）。後來因脫絞、練白技術的發展，明代後期採用此種較柔軟光滑，易於著色的熟絲，故可染出光亮潤澤的淺色，也可染出玄色及墨色等高級「熟貨」。參閱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頁55-57；韓大成，《明代社會經濟初探》，頁241。

55 參閱范金民、金文，《江南絲綢史研究》，頁251。

56 清·陳夢雷纂集，《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上海：中華書局，1934，據清雍正四年殿版銅活字本影印），冊115，卷681，〈蘇州府物產考〉，頁50。

57 參閱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頁150-151。

均衡有關。因棉織品種種優點而逐漸受到人們的歡迎。然而植棉業發達的北方地區由於自然環境條件的限制，以致棉織業難以發展，尤缺質優耐用的貨品。因此為江南地區發達的棉紡織業提供有利的商品銷售機遇。如蘇州嘉定地區的棉布，「商賈販鬻，近至杭、歙、清、濟，遠至薊、遼、山、陝，其用至廣，而利至饒」⁵⁸。又如常熟的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載舟輪行賈於齊魯之境者常十六。彼氓之衣縷，往往為工也」⁵⁹。而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所說的江南之布「泛舟而鬻諸北」⁶⁰的現象，直到北方棉作興盛之時仍未改變。可見蘇州地區所產棉布販運範圍之廣，全國各地市場需求之大。

至於絲綢貿易，蘇州本即以絲綢生產及加工業聞名天下，加以基礎深厚，並日趨繁盛的商品經濟、流通體系的完備、商業服務配套設施的建立，促使其絲綢商品市場交換極為發達。萬曆時張瀚曾說：「余嘗總覽市利，大都東南之利莫大於羅、綺、絹、紵，而三吳為最……而今三吳以機杼致富者尤眾」⁶¹「轉貿四方，吳之大資也」⁶²。明代小說《醒世恆言》中也描述王江涇一鎮：「那市上兩岸紬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紬疋，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⁶³；清康熙年間文人張大純在〈吳中風俗論〉中也談及：「人第見金閭之列肆錦繡成堆，兩濠之牙行百物充

58 韓浚等修，《(萬曆)嘉定縣志》，卷6，〈田賦·物產〉，頁476。

59 馮汝弼、鄧鞞纂修，《(嘉靖)常熟縣志》，卷4，〈食貨志〉，頁1053。

60 明·徐光啟，《農政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叢書》子部第3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35，〈木棉〉，頁506。

61 張瀚，《松窗夢語》，卷4，〈商賈記〉，頁85。

62 蘇祐、楊循吉，《(嘉靖)吳邑志》，卷14，〈土產〉，頁376。

63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18，〈施潤澤灘闊遇友〉，頁359。

棟」，雖不見得是「其人之自有」，但仍說明了「出於商賈所居停，編民所市販，攘攘而來，據此貿易耳」⁶⁴。此外，萬曆年間蘇州出現由外地商人建立的會館，如當時由福建商人始建的三山會館所屬行業之一即為絲綢⁶⁵，也反映出全國各地商人不遠千里奔赴此地，從事絲綢貿易的盛況。蘇州地區絲綢商品不僅供應本地需要，其消費市場更遍及全國，無遠弗屆。甚至在遙遠的北方及西北地區也可獲得各色各樣的蘇州羅緞⁶⁶。在東北，成化年間「南方商人多攜羅緞易米中鹽，以致俗尚奢侈」⁶⁷，說出絲綢商品透過繁複的貿易網絡，散播服俗於異地的情景。此外，來自各方的商人也將蘇州的絲織品輸入中原、川漢及嶺南等廣大地區，可見蘇州絲綢貿易規模之興盛，範圍之廣袤，牽動了全國各地服飾風尚的轉變。

由於絲綢生產規模的擴大、產量增加，及高低檔品種增多及商人的普遍活躍、絲織商品交易活動的頻繁，使原先一向為奢侈品生產的絲織手工業，在明清以後產生變化。這種高級消費品價格逐漸降低，使絲綢奢侈品和普通消費品間的界線日益模糊。據研究，絹的價格在明代平均比宋代降低60%。因而明代以後絲織品不但流行於通都大邑，且深入陬邑鄉村、邊塞遠郊。不僅富貴之家衣帛，中產之家穿戴綢緞亦十分普遍，即使市井小民、工匠農夫亦有用紬絹色衣的情形。如此一來，追求奢侈、競逐華麗新異服飾的社會風尚，因上述工商業經濟繁榮因素而較前更易於散播，而追逐時髦的心理需求又促進手工業生產及絲織商品貿易的更加繁榮。「四方

64 清·張大純，〈吳中風俗論〉，收入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甘蘭經、吳琴校點本），頁2。

65 蘇州歷史博物館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325。

66 范金民、金文，《江南絲綢史研究》，頁238。

67 明·劉吉等撰，《憲宗實錄》，收於《明實錄》第39-50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紅格鈔本所缺則據別本補），卷262，頁6b，成化二十一年二月癸丑朔。

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⁶⁸，說出絲綢商品生產交換與廣大市場需求、社會心態與消費行為之間的密切關係。綜上所述，明代蘇州居於全國性全國商品流通窗口，其絲棉織商品貿易遍及四方，使吳地因歷代累積而來的雄厚經濟實力，塑造了服飾風尚獨步天下的地位，並使之更為普遍的散播到各地，進一步導致晚明日常生活俗尚的顯著變化。可見蘇州經濟發展狀況與其成為服裝時尚散播中心的密切關係。

5、 結論

從記載明代以後蘇州地區風土民情的相關方志及文集中，可看出蘇州府城及其周圍新興市鎮從蕭條至繁華的變化。包括城市範圍擴大、城居人口增加、工商業興盛，顯示其社會經濟進步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經濟功能超越政治功能，主導了城市發展特色。作為明清時期全國最繁華的大城市，此一經濟發展過程表現在蘇州府城周圍工商業市鎮的大量興起、商品市場交換之經濟網絡的逐漸形成與開拓，再加以海外市場的需求及白銀大量流入的刺激，蘇州成為江南區域經濟，甚至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呈現獨具一格的工商業經濟結構特色。而具有地方特色的工商業經濟的發達，對此區域甚至全國社會風尚變遷方向與內容有十分深遠的影響。

社會風尚變遷中最先出現，並最為明顯普及的是服飾風尚的更移。蘇州能成為服飾風尚的轉變最早地區之一，成為其傳播的策源地，並處於全國領導地位，自與其絲棉織手工業、成衣業的進步、商業貿易的興盛、市場流通網絡的通暢與廣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絲織品產量與品質的提高、絲綢棉布及成衣市場需求的擴大為服裝時尚的形成與前進，製造了妥善機制，表現在人們心理意識、消費觀念及行為的轉變，使服飾風尚由明初

的儉樸演變至中葉以後競逐奢華新異，僭禮逾制、追求時尚的情形。呈現出一幅自官僚士紳、富商大賈以至市井小民、工匠農夫衣著花樣的不斷翻新，色彩漸趨耀眼奪目，迥異於傳統社會風貌的民俗生活圖畫，道出了蘇州經濟結構及服飾風尚間交互作用的密切，及二者發展演變軌跡的特色及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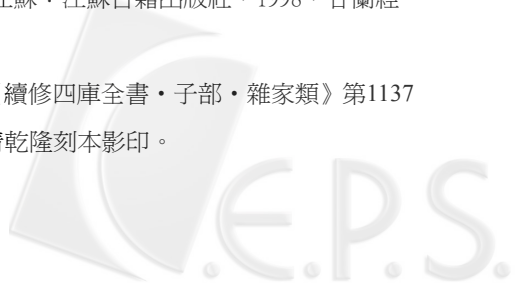
徵引書目

(1) 史料

1. 明·牛若麟纂輯，《(崇禎)吳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2. 明·王士性，呂景琳校，《廣志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3. 明·王琦，張德信點校，《寓圃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4. 明·申時行纂，《大明會典》，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據明萬曆刊本影印。
5.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收入《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據明萬曆七年張仲頤刻本影印。
6.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據清道光七年姚氏扶荔山房刻本。
7. 明·林世遠、王鏊纂修，《(正德)姑蘇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26冊，北京：書目文獻社，1993，據明正德刻嘉靖續修本影印。
8.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叢書》子部第3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9. 明·屠隆，《由拳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據明萬曆間刊本影印。
10. 明·張瀚，盛冬鈴點校，《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
11. 明·莫旦，《(弘治)吳江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據明弘治元年刊本影印。



12. 明·馮汝弼、鄧載纂修，《(嘉靖)常熟縣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27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13.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臺北：鼎文書局，1976。
14. 明·劉吉等撰，《憲宗實錄》，收於《明實錄》第39-50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紅格鈔本所缺則據別本補。
15. 明·蔣以化，《西台漫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子部·雜家類》第66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明萬曆二十一年自刻本影印。
16.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入《明代筆記小說大觀》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據明萬曆44年如書軒刊刻本。
17. 明·韓浚等修，《(萬曆)嘉定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據明萬曆三十三年刊本影印。
18.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康熙本。
19. 明·顧炎武，《亭林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上海涵芬樓景印康熙刊本。
20. 明·顧秉謙等修，《神宗實錄》，收於《明實錄》第96-12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鈔本微捲影印，紅格鈔本所缺則據別本補。
21. 清·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甘蘭經、吳琴校點本。
22. 清·袁棟，《書隱叢說》，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第1137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據清乾隆刻本影印。



23. 清·陳荀纒等修、倪師孟等纂，《(乾隆)吳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據清乾隆12年石印重印本。
24. 清·陳夢雷纂集，《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第115冊，上海：中華書局，1934，據清雍正四年殿版銅活字本影印。
25. 清·龔煒，錢炳寰點校，《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5。
26. 蘇州歷史博物館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

(2) 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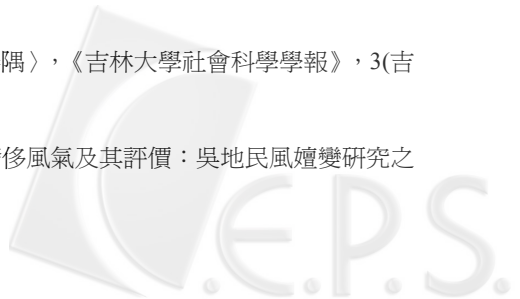
1.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方駿、王秀麗、羅天佑合譯，《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2004。
2. 毛佩琦主編，《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太原：山西教育，1996。
3. 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4. 王長俊主編，《江蘇文化史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5. 王毓銓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2000。
6. 王衛平，《蘇州史紀(古代)》，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
7.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8. 李伯重，《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臺北：聯經，2002。
9. 李伯重、周生春主編，《江南的城市工業與地方文化(960-1850)》，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10. 李學勤、馮爾康主編，《中國古代市場與貿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11. 李龍潛，《明清經濟探微初編》，臺北：稻鄉，2002。
12. 谷風出版社編輯部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下)》，臺北：谷風

出版社，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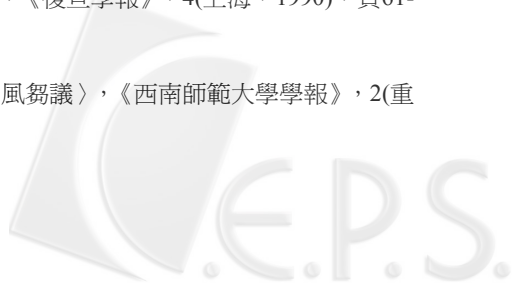
13. 段本洛、張圻福，《蘇州手工業史》，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14.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5. 范金民、金文，《江南絲綢史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
16.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7. 陳寶良，《悄悄散去的幕紗--明代文化歷程新說》，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8. 傅衣凌主編，《明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20. 劉翠溶、石守謙主編，《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
21.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22. 錢杭、承載，《十七世紀江南社會生活》，臺北：南天圖書公司，1998。
23. 韓大成，《明代社會經濟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 期刊論文

1. 牛建強、汪維真，〈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風尚取向的更移〉，《史學月刊》，5(鄭州，1990)，頁30-36。
2. 王淑芬，〈明末清出蘇州城經濟與社會結構初探〉，《思與言》，33:1(臺北，1995.03)，頁27-59。
3. 王新，〈明清時期社會風尚變革舉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吉林，1990.09)，頁41-43。
4. 王衛平，〈明清時期太湖地區的奢侈風氣及其評價：吳地民風嬗變研究之



- 四)，《學術月刊》，2(上海，1994)，頁56-61。
5. 吳美琪，〈流行與世變：明代江南士人的服飾風尚及其社會心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6. 吳琦，〈晚明至清的社會風尚與民俗心理機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6(武昌，1990)，頁75-81。
 7. 孟彭興，〈明代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市民社會生活的嬗變〉，《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上海，1994)，頁166-173。
 8. 林麗月，〈世變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明史研究通訊》，4(臺北，2001.12)，頁9-20。
 9. 林麗月，〈明代中後期的服飾文化及其消費心態〉，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頁493-494。
 10. 范金民，〈明清時期市鎮的發展特點〉，《南京大學學報》，4(南京，1990)，頁89-95。
 11. 喬傳，〈晚明社會轉型的畸形因子〉，《歷史月刊》，105(臺北，1996.10)，頁89-96。
 12. 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南開學報》，4(天津，1994.07)，頁53-63。
 13. 張華，〈明代太湖流域市鎮興起的原因及其作用〉，《南京大學學報》，4(南京，1990)，頁96-103。
 14. 劉志琴，〈晚明世風漫議〉，《社會學研究》，3(北京，1992)，頁107-111。
 15. 樊樹志，〈江南市鎮文化面面觀〉，《復旦學報》，4(上海，1990)，頁61-65。
 16. 藍東興，〈明朝中後期奢侈浮靡之風芻議〉，《西南師範大學學報》，2(重慶，1993.04)，頁7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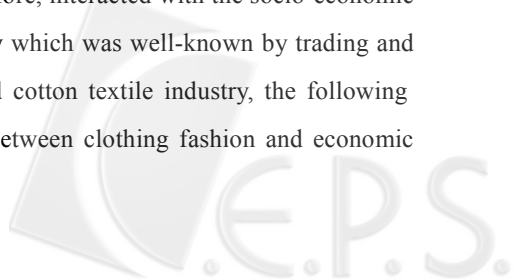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ing feature of clothing fashion in Suzhou and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in late Ming Dynasty

Yang-Shing Cheng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Ming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dramatic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mid Ming Dynasty, the generation of budding economic factors, thought, and value system before and after the zheng de(正德)resulted in entirely different cultural aspects, which represented a transition from conservative to active reformation. This change in cultural custom began in Suzhou fu(蘇州府), songjiang fu(松江府), southern bank Yangtze River, and i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in industry. Also, the progression adjusted the local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as well as people's lifestyle, thought, and awareness. From then on, a new society was thus generated.

In the whole southern bank Yangtze River, Suzhou was the most typical area where the social custom changed first,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common phenomenon was the change in apparel. The citizens purchase on gorgeous clothing, luxurious fashions which went against the ceremonial was full of this area. The change in apparel, therefore, interacted 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Suzhou was a city which was well-known by trading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including silk and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the following study thus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othing fash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features caused by the relationship.

Keywords: late Ming Dynasty, Suzhou, economical development, clothing fashion, silk and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